

新书摘·《1970年代 我的乡村老师生涯》节选

书虫

对照杏坛前辈，我明白了自己与一个合格的教师相比，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距。人家是山，我只是个小土堆；人家是海，我只是个小水池。见贤思齐，我必须努力读书，让自己尽快成长。

我频频去她娘家，扑向了两只破酒篓。

她娘家在一村，在学校南面二百米。两条大街交叉成十字，从街口往西走五十米，拐进一条两米宽的夹道，踩着—溜石板进去，推开一扇破朽的木门，便进入了娘家的院子。阴森森的树下，趴着三间破草房。

这里，本来是宋家沟头人物宋世厚的油坊，曾经雇人榨取大量花生油，供自家吃，并用于贸易。宋世厚的大儿子叫宋家栋，1930年代在临沂读乡村师范，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八路军，曾在沐河边担任过共产党的乡长，在沂蒙山区抗大分校当过教员，在莒县城外的滨海军区农场当过场长。1947年土改复查中，宋家栋的贫雇农把宋世厚杀死，还向上级提出要求，把他儿子宋家栋也弄回来干掉，以斩草除根。宋家栋不敢在本地工作，只好报名成为南下干部，到河南洛宁县担任工商银行副经理，1949年牺牲。他的老婆孩子虽然是烈属，但因为成分是富农，在村里还是备受歧视。无奈之下，他的大女儿就嫁给了下中农出身的赵洪都，1955年夏天生下了我。

她娘没有儿子，三个女儿出嫁后，她就独居在这个荒凉破败的院子里。为了不让她娘冷清，母亲把我送到这里给她作伴。在我之后，我的弟弟妹妹，两个姨家的表弟表妹，都曾在这里住过。我在这里时，除了享受她娘的慈爱与呵护，还享受她家从两个破酒篓里散发出的气息。

那是书香。

我不是在做文学渲染，我小时候真切地闻到了那种别致的味道。味道的来源，一是线装书的纸张；二是纸装书里夹着的树叶。我不认识那种树叶，问她娘，她说那是樟树叶，是姥爷夹在里面防书虫的。其实，那些书不是姥爷一个人的，还有我三姨宋桂英的。她作为烈士子女，被教育部门保送至临沂

师范，毕业后在我们公社驻地教学，嫁给一个叫刘玉柱的同事。1968年底，他俩遭遇“一鞭赶”，回了临沂老家。三姨用过的课本，一直存放在她娘家家里。她娘家中有两个簸壳，本来是用于牲口驮运的两个大酒篓，不知什么时候破得只剩了下半截，她娘便用它装书。我从能记事起，就经常扒拉着那些书看。虽然不识字，只能看里面的插图，但也觉得那是个奥妙无穷趣味无穷的世界。等到上学后认得一些字了，它们更成了我的心爱之物。

我当上民办教师，当天就去告诉她娘。她听了不胜欣喜，说：“好呀，你老姥爷当过私塾先生，你姥爷当过八路军的教员，你三姨正当着，你现在也当上了，是第四代了。”经她这么阐明，我忽然有了一种庄严感、使命感。我说：“我得好好看看俺姥爷俺三姨的书。”她娘指着两只簸壳说：“看看吧，你当个大书虫，把这些书都吃进肚子里！”

书虫，我在那两个簸壳里见过，它们的身体呈银灰色，长约一厘米，乱钻乱拱，专吃纸页。她娘每年都在三伏天选个晴朗的日子，把两簸书搬出去，摊在院子里晒，但还是晒不绝这种小生灵。它一年年生生不息，让一些书有了深深浅浅、形状各异的孔洞。我读书时，面对一些句子的断掉、画面的残缺，咬牙切齿痛恨书虫。

1970年冬天，我变成一只圆颅方足的书虫，有空就去她娘家，在书堆里乱拱。这时我发现，姥爷和三姨的书，汇集了新旧两个教育体系的施教内容，对比鲜明，趣味迥异。我常常看过姥爷的《三字经》，再去看三姨的《动物学》；看过三姨的历史教材，再去看姥爷的三民主义读本。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抗战前夕姥爷在临沂买的几本小说集，其中有《阿Q正传》《沉沦》《超人》等等，汇集了一篇篇我记不着篇名与作者了，但其中的情节让我终生不忘：在一个月夜，在一片山地里，两群敌对的士兵持枪靠近，准备厮杀。然而，在他们中间的旷野上突然响起了笛声，是一个人冒死吹奏的。笛声是那样美妙，哀婉，结果把两队士兵

都感化了，他们放下枪支，握手言和，在月光下一起歌唱舞蹈。这篇作品，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影响，造成了我反战反暴力的一贯立场。三姨读中学时，语文课分为《语法》和《文学》两门，那几本《文学》课本，也让我深深迷恋，因为其中有许许多多古今中外的文学佳作。

我读姥爷留下的《三字经》，还直接导致了一本夜校教材的诞生。那时候上级要求在成人中扫除文盲，扫盲的任务由各村教师负责。宋家星联系三个村的团支部，让他们开会动员，并让三个村各买一盏汽灯，供夜校使用。因为没有教材，宋家星让我主笔编写。我接受了任务，就从新华字典上选了二千来个字，仿照《三字经》，三个字一句，编成顺口溜。两千来字抄在一张大纸上，每用一字，就从纸上勾掉，不能有重复使用的。这就有了难度。有时候为了安排好一个字，要反反复复折腾，累得我头疼欲裂。当然，新《三字经》的内容，都是紧扣时代要求，文革色彩浓厚。当时上级规定，一个人认识一千五百字，就算摘掉了文盲帽子，我好不容易让新《三字经》达到了这个字数，而且一个字也没有重复的。教材编完，经老师和团干部们讨论审定，就买来钢板、蜡纸和油印机开始印刷。由于缺乏经验，刻字力度过大，印不了多少，蜡纸上的一些笔划就在油滚的碾压下开裂，致使文字变形，字迹模糊。宋家星记得，有一位公社干部下乡，看了我们的操作，笑我们笨，搞得我们很没面子。

那个年代流行一个词语，叫“瓜菜代”，意思是没有粮食果腹，就用瓜菜之类代替。我们编印的这份教材也算文化上的“瓜菜代”，但是夜校毕竟有了教材。开学那天，三口教室里汽灯明亮，带着油墨味道的教材发到了那些文盲、半文盲男女青年手中，让我很有成就感。我和宋家星、王玉翠各教一个班，带领大家，指导他们写。我们教夜校是有报酬的，每教一晚，生产队为我们多记两个工分。莒南人把汉字戏称为“蚂蚁爪子”，那些夜校学员经常在放学时总结：今晚上又学了几个“蚂蚁爪子”。然而，第二天晚上再到这里，有人还



能记着，有人则说“就着糊涂喝了”。在我们那里，把糊粥叫“糊涂”，这话的意思是糊涂了，把学到的“蚂蚁爪子”忘记了。

我这只大书虫，胃口越来越大，她娘家的那些书已经喂不饱我，我就在村里借书看。其实宋家沟的藏书人家并不多，有的人即使有书也不外借。我家住在村东岭坡上，再往上走一百来米就是一个制高点，叫“老围子”，因为在土匪横行的年代，这里曾经建起一圈围墙，供村里人集中居住以避匪灾。许多个夕阳西下的黄昏，我站在“老围子”的废墟上，望着炊烟四起的村庄，从村南头看到村北头，就像小偷数算谁家有钱一样，数算着谁家藏书，并且能借给我看。有一天，我忽然看到村子中央的某一户，想起他家有几本武侠小说，就上门去借。但书的主人告诉我，书没了，找不到了，我空手而归，羞愧交加。

见我爱看书，宋家星对我说，你可以到县图书馆借。我说，人家不认识我，能借给我吗？宋家星说，我有咱大队团支部的借书证，你拿着用吧。个人借书证，一次只能借几本，用集体借书证，一次可以借几十本。他的话，让我在黑蒙蒙的求知道路上突然看到了光明！第二天，宋家星果然将一个红塑料皮的借书证给了我。星期天，我借了大队的自行车骑着，兴冲冲跑了四十里地，到县城进了图书馆。把

借书证递上，漂亮的女管理员让我自己进去选书。那一刻，我心花怒放，幸福至极。我晕乎乎地走进书库，站到书架中间，像腾云驾雾进了天堂。我将手指拂过一串书脊，那种触觉像电流一样传到体内，让我的心脏震颤不止。我想，这么多书，借哪些好呀？后来想，反正有借书证了，我要把这里的书都看个遍！于是，我就选了一些最想看的，如《红楼梦》等等，抱着去了外面的借阅柜台。办完手续，我将书装进一个大包，捆到自行车座上，春风得意，欣然回村。

我没敢将书拿到学校，而是藏在家中的西屋里。晚上教完夜校回来，和我通腿睡觉的二弟已经进入梦乡，我就看起了《红楼梦》。灯是用墨水瓶做的，装了煤油，挂在床头的墙上。因为要省油，只让灯芯露出一一点。我借助如豆的灯焰，像成了精的书虫，饕餮享用盛宴。《红楼梦》是四大本，第一本让我一口气读到天亮。二弟醒来发现，告诉母亲，母亲训我：你不可能这样，点灯熬油不说，你睡不足觉，怎么上课？你照照你的那张脸，都熏成什么样子了？我到屋里照照镜子，见我鼻孔乌黑，像个小丑。洗了洗脸去学校，我哈欠连连，语无伦次。我想，这样整夜看书真是不行，我不能耽误教学。后来，我晚上读到半夜，就强制自己放下书本。

虽然不再通宵达旦，但每天晚上都能看上半本。白天抽空就看，在家吃饭的时候也是边吃边看。有一回，我正看着，面前的书突然被父亲抓起，扔到了门外——他嫌我吃饭还看书，太不像话了。经他训诫，我再不敢把书本带到饭桌上。

看完手头的书，到县城再借。我那时看书没有规划，什么书都借，就连《加纳史》《蜜蜂的秘密》这样的书也读得津津有味。当然，文学名著也读了一些。图书馆里有一套鲁迅的书，白色封面，带浮雕头像，共20多本，我全都读了。

这一波读书高潮，持续了三年，直到我被调到外村担任代课教师，才恋恋不舍地交出了借书证。那个借书证中间换过，因为它被密密麻麻的书名填满。

我永远感谢莒南县图书馆，是她在那个年头哺育了我，让我这个滥竽充数的小民办老师由“识仁教俩”变成“识四教俩”“识五教俩”。

（摘自《1970年代 我的乡村老师生涯》，赵德发著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）

人不能贪图安逸为生活所累

赵宗符



1·14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

解：孔子对好学之君子的描述，这样的人对于饮食、居住等等，人们日常所追求的东西，并没有太大的欲望，而是对事业勤劳敏捷、说话谨慎，经常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。

从负的方面讲，人不能贪图安逸，为生活所累，如果他只是对物质欲望的满足很热心，其余便不足观矣。现代著名科学家、思想家爱因斯坦在其文章《我的世界观》中

讲“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，从客观的观点来看，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。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，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。就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——这种伦理基础，我叫它猪栏的理想。照亮我的道路，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，是善、美和真。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，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——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，

那么在我看来，生活就会是空虚的。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——财产、虚名、奢侈的生活——我总觉得都是可卑鄙的。”这个被评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20名科学家之首的人，这颗被称为20世纪最优秀的大脑讲出的话，与孔子的话的意思是高度一致的。

当然，从正的方面讲，一个人勤敏于事业、不事吹嘘自己，在严格意义上还不算好学，还要去找有道之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匡正，这就是所谓做正确的事，做事的方向也要正确。这才是好学。

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观来看，人可以概括为一个一元两面三层五维的存在本体，其中这个存在的系统的三个层次系统分别为身（生理）、心（心理）、神（精神），五个维度分别为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。神层这一精神境界是人优于其他动物所独有的。君子之学，是为己之学，其好学的目的不

在于实现爱因斯坦所说的猪栏理想，不在于吃好的、住大的、有所谓的世俗的各种成功，而是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使自己不断实现为真正的人。这样的人在芸芸众生之中也有很多，他们表面看来也许没有什么，但他们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，连着无穷的宇宙。他们沉静而沉默，但却可以说符合了人之为人的理念，对这样平凡的好学之人，我们要致以崇高的敬意。

1·15子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诗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’其斯之谓与？”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诗已矣！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

子贡道，纵有钱却谦虚好礼。”子贡一听接着说：“《诗经》上说‘要像对待骨面、象牙、玉石一样，先开料，再锉锉，细刻，然后磨光。’那就是这样的意思吧？”孔子听了很高兴，叫着子贡的名字讲“赐啊，现在可以同你讨论《诗经》了，告诉你一件，你能有所发挥，举一反三了。”

这里讲了两层精神境界，低一点就是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”，再高一点就是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，子贡一听就举了《诗经》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的句子，来说明精神境界的提升，需要不断修养，孔子肯定了子贡的理解。

1·16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

解：孔子说：“别人不了解我，我不急；我急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。”这强调了为己之学，儒家认为学习、做事是为了知道，行道，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，取得功名利禄等等。人生在世，可求者在我，通过学习、工作等加以修行，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就已是幸福了。至于急着要了解别人，那是因为一名儒者活在世间，要能判断是非、正邪、善恶，才能更好地学习、成长、做事。